

生态文明理念探源

——兼论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

陈 杨

(杭州师范大学 哲学系 杭州 311121)

摘要: 生态文明理念一般被认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的。更广泛的文献调研发现,至少从 1951 年开始,世界各国学者已经逐渐使用“生态文明”一词。作为重要的早期研究者,匈牙利社会学家塞什陶伊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对生态文明进行过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式现代化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由此提出环境保护事业必须由生态文明这一积极的战略目标指引,以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实现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尊重不同国家特殊国情的前提下,他进一步探讨了以“生态的世界文明”为最终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三阶段路线图。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环境思想史; 全球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生态文明理念在走向世界、深度参与构建国际环境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些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障碍是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概念,是“中国术语”,不具有全球普遍性。^①这种观点源于对生态文明理念发展史的误解。其实,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学者已经在学术文献中使用“生态文明”一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匈牙利社会学家安德拉什·塞什陶伊(András Szesztay, 1926—2017)^②对生态文明理念进行过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思考。此后,又有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生态文明思想框架下进行研究。对生态文明理念历史源流的探索,尤其是对生态文

明早期研究者塞什陶伊相关学说的挖掘和阐释,将有助于消除“生态文明只适用于中国”的错误观点,为进一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一、生态文明理念源流考辨

关于生态文明理念的起源,国内外学界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1) 生态文明相关研究可以追溯至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自 1957 年开始的从生态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1](2) “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德国政治学家和马

收稿日期: 2023-8-6

基金项目: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规课题“全球生态文明探索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意义及其推广路径研究”(23CCG17)。

作者简介: 陈杨(1989—),浙江诸暨人,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生态思想史与环境哲学。

① 一个典型案例是: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在向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提交《传统医药应符合生态文明思想》提案时遭到大量质疑,自然保护联盟(IUCN)相关国际专家和其他国家会员单位反对“生态文明”概念,甚至许多中国专家也认为“生态文明”是中国术语,不适合出现在 IUCN 决议和决定中。最终,该提案被改为《传统医药需符合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删除提案中所有的“生态文明”表述。参考: <http://www.cbegdf.org/NewsShow/4937/11725.html>。

② 塞什陶伊 1926 年生于匈牙利北部城市尼赖吉哈佐(Nyíregyháza)。1950 年从布达佩斯大学毕业后,成为普通工人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在此期间,他结交到匈牙利著名政治家、社会学家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űs),成为后者的学生和合作者。1963 年,在赫格居什的领导下,塞什陶伊参与创建匈牙利科学院(MTA)社会学研究小组,成为该组织最早的五位成员之一。1968 年,由于抗议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塞什陶伊失去匈牙利科学院的研究职位,后被调至城市规划科学设计院(Városépítési Tudományos és Tervező Intézet)工作,直至 1986 年退休。

克思哲学研究者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 在1978年明确提出的。^[2-4] (3) 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定义并使用生态文明理念的是苏联学者利皮茨基(В. С. Липицкий)。他在1984年发表个人生态文明素养培育方面的相关研究。^[5-7] (4) 在中国, 生态文明理念则最早是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先生于1986年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提出的。^[2] 通过更广泛的文献调研, 我们发现这四种观点均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 梅棹忠夫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明”一词, 他只是将生态学研究引入对人类文明历史变迁的思考之中。他不是这种方法的首创者。早在1929年, 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就曾提出关于地理学、生物学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文明的生态学(ecology of civilization) ”和“文明的生态观(ecolog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等概念。^[8] 汤因比(Arnold Toynbee) 等学者也曾经从生态角度思考文明的变迁与兴衰。^[9] 而且, 这种关于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次, 在梅棹忠夫和费切尔之前, 就已经出现将“生态(ecological) ”与“文明(civilization) ”连用构成一个专门术语的情况。根据现有文献, 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最早使用“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词的可能是美国环境规划学者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早在1951年, 他就用“生态文明”来表示自然具有的秩序: “(荒野的) 生态文明, 它的动植物平衡的经济体系, 永恒地维持着地区的宜居性。”^[10]^[217] 巴西思想家、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Gilberto Freyre) 在1963年曾倡导在巴西建立一种“位于热带地区的现代生态文明”(moder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11]^[23-24] 英国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Charles S. Elton) 在1966年指出, 某些甲虫将腐肉按照不同部位进行分解并分类贮藏的习性展现出相当高程度的“生态文明”水平。^[12]^[325-326] 当然, 这一阶段的“生态文明”概念在内涵上与当前学术界对该词的使用仍然存在一定差别。

第三, 利皮茨基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的确是较早被引入中国的相关研究之一, 但是他并非苏联学

术界最早或最系统地使用生态文明理念的学者。利皮茨基于1984年发表《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使个人养成生态文化的途径》(Пу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лично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зрел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一文。此文由张捷翻译为中文, 于1984年9月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快报》上。^[13] 利皮茨基在论文中多次使用的“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概念, 直译应为“生态文化”, 张捷将其译为“生态文明”。^① 根据俄罗斯当代学者的考证, “生态文化”一词最早是由苏联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柯冈(Л. Н. Когана) 在1973年一次关于“科学进步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14]

第四, 在叶谦吉先生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相关论述之前, 生态文明理念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并开始在不同场合下使用。1982年孟庆时摘译发表费切尔的论文, 其中指出“人们向往生态文明是一种迫切的需要。”^[15] 这是“生态文明”一词首次出现在中文学术语境之中。此后, 利皮茨基、阿列克谢耶娃(В. Т. О. Алексеева) 等苏联学者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教育的讨论获得引介。^[16] 相关论述甚至出现在1985年2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国内教育学者、文化学者、林业工作者等都曾在叶谦吉之前提及生态文明理念。^[17-18] 可见, 叶谦吉不是国内首先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的学者, 其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定义并较为系统地阐释生态文明理念。

除了以上指出的问题之外, 国内外学界关于生态文明理念起源的常见观点还忽视了一位重要的研究者——塞什陶伊。他是目前已知最早对生态文明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1971年8月, 他在国际地理联合会欧洲区域会议(IGU European Regional Conference) 上, 发表了题为“环境规划方法论模型的社会学途径”(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wards a methodological model of environment planning) 的报告, 明确提出: “(环境保护的) 整体战略旨在实现积极的目标, 那就是‘生态文明’。”^[19]^[309] 1972年4月, 该报告的匈牙利文摘编版以《环境保护与社会学》(A Környezetvédelem és szociológia) 为题发表在《源泉》(Forrás) 杂志上。^[20] 同年9月和12月, 他进一步发表了两篇关于生态文明的专题研究论文, 其中

① 在苏联学术界“文化(культуры) ”与“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 ”概念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部分苏联学者认为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在中文翻译时, “文明”或“文化”都是对 культуры 的常用译文。

指出“应对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出一种生态文明(ökologikus civilizáció)”,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应当是“生态的世界文明(ökologikus világcivilizáció)”,并提出分三个阶段实现全球生态文明的路线图。^[21-22]塞什陶伊提出的生态文明学说,不仅在时间上早于柯冈和费切尔,而且在理论的系统性上也更胜一筹,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二、塞什陶伊生态文明学说的基本内涵

1. 生态危机的特征与根源

塞什陶伊对生态危机的特征和根源有着超越同时代西方学者的深刻认识。西方学者往往认为环境问题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遭遇的特殊问题,它虽然要求西方文明在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科学技术、道德规范或宗教传统等方面做出一定改变。但是,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遇到的诸多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整体上可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框架下加以解决。与此不同,塞什陶伊认为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异化(elidegenedés),全球生态危机不仅仅是“历史性的”,更是“末世论的(eszkatológikus)”。^{[20]21-22}也就是说,全球生态危机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可能遭遇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且更可能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考验,是决定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末日审判”。

生态危机的末世论特征具体呈现出三个方面:首先,生态危机造成的最终灾难可能终结人类物种的历史。其次,与其他可能终结人类物种或造成全球灾难的危机不同,生态危机是“当前文明阶段亿人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副产品”。其他许多危机,例如核战争阴霾,是可以单纯的政治或技术途径加以解决的。但是,生态危机的应对却取决于亿万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它要求一种整体性变革。最后,生态危机的挑战是对人类全体的挑战。它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所有人类社会合力做出改变。个别国家或地区付出的努力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取决于全球其他国家是否做出相应的行动。^{[19]300}

基于对全球生态危机末世论特征的深刻认识,

塞什陶伊提出“环境的恶化仅仅是异化的一种表征因素”。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egymástól)。同时,环境问题也与人的本质问题、人与他人关系的疏离密不可分。^{[20]22-23}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必定同时也是我们与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危机。

2. 生态文明是环境保护事业的整体战略目标

塞什陶伊率先意识到,环境保护事业需要一种整体的战略目标作为统领。这种目标必须是正向的、积极的。环境保护不能仅仅局限在西方环保人士强调的“禁止做什么”“减少做什么”,而更需要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特别是告诉人们如何恢复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缺乏整体的、积极的目标,环境保护就始终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其具体政策和实践无力应对具有“末世论”特征的深刻危机。

在20世纪70年代初,塞什陶伊已经注意到当时的环境保护技术正发展得越来越快,关于遏制环境污染的法律也制定得越来越严格,但是环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趋恶化。他富有前瞻性地指出:“如果技术方面的行动无法与(生态文明)这一整体战略目标相称,那么(技术行动)就只是阻止破船上产生更多裂缝。这艘船仍然会沉没——只是沉得慢一些而已。”^{[19]309}在塞什陶伊看来,环境问题的现实图景已经清晰地表明“仅仅从保护方面来应对环境危机是不够的”,应对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的出路最终还是在于实现积极的目标,即发展出一种生态文明。^{[21]1834}

只有在生态文明整体目标的积极引领之下,人类文明才能进入一种全新的形态。正是因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必须“以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和人性的改变为前提”,所以“这类改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不仅仅是‘开启历史中的一个新时代’,更是赋予历史本身以全新的方向和全新的特质。”^{[19]300}

3. 生态文明的核心意涵是恢复文明与自然的和谐

既然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那么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就在于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进而恢复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浪潮中,塞什陶伊认为,许多环境保护观念不仅没有增进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反而可能加剧两者之间的疏离。因为这类环境保护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对

立起来,认为自然外在于城镇村庄,其关注点聚焦于维护城镇村庄等人工环境的清洁与美观。在这类观念下,生活垃圾的及时清运、工业污染物的防治、水和空气的净化、城镇规划等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核心,而类似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活动则被许多人视为无关紧要的。^{[19]312}

塞什陶伊更赞同另一种环境保护。它以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互交织的观念为基础,以修复和维护这种密切关联的状态为目的。在垃圾和污染物治理问题上,它关注的是物质循环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双向畅通,而非单向的清运或排放。此外,野生生物保护、国家公园建设等举措,由于能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具有重要意义。^{[21]1833}

生态文明不仅要求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方面实现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互通互联,更需要从精神上或人的生存方式上,进一步调和人与自然、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塞什陶伊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仅仅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部分。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却是极端重要的一个部分。”^{[19]312}而恢复人与自然、文明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关键在于构建和扩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同时也是人与他人的亲密共同体,他将其称为“保护主义者共同体(conservationists community)”。

4. 通过扩展保护主义者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

塞什陶伊认为共同体的建构性力量在于共同体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忠诚(fidelity)”。在“保护主义者共同体”中,所谓“忠诚”就是意识到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之中,并对他人和自然怀有亲密的情感。这种“忠诚”也被他称为“生态态度(ecological attitude)”。^{[19]309}需要指出的是,塞什陶伊强调的对自然的亲密情感,不同于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多愁善感或思乡之情,也不同于超验主义对自然的近乎宗教的感受体验,而是当个体适应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并对其所占据的位置感到满意时,个体对共同体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亲切之情。这种情感类似于在和谐家庭中子女对家的眷恋以及爱国者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这种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亲密关系的强调,应当与塞什陶伊早年对大学毕业生如何融入社会分工的社会学研究相关。^[23]

扩展“保护主义者共同体”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该共同体怀有“忠诚”。塞什陶伊清楚地认识

到,这一点不可能通过媒体舆论的宣传说服或个人的物质激励实现,至少这些方法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保护主义者共同体”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被“生态文明”这一正面的、积极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不仅不是为了享受某种利益,反而要求“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被要求完全牺牲自身的物质利益。事实上,这里所谓的自我牺牲,首先不是物质方面的,而是精神方面的,是愿意改变当前整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19]309-310}

“保护主义者共同体”的扩展将不仅消弭人与自然的疏离状态,同时也将消弭人与他人的疏离状态。在塞什陶伊看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例如在传统家庭和爱国者同盟之中对亲属和同胞的亲密关系,能够促使人们寻求与自然建立类似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亲近自然将使得个人更加热爱家乡、热爱同胞。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保护主义者共同体”之中,环境治理才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塞什陶伊希望,最终,“保护主义者共同体”不是只由少数自然爱好者、环境相关从业者组成的,而是由地球上所有人组成的。如此,生态文明的最终形态——全球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实现。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阶段

在塞什陶伊看来,生态文明是通过扩展“保护主义者共同体”实现的。他强调这种扩展过程必定反映着每一个国家“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特殊性”,不存在一个现成的通行方案,也不可能提前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规划。^{[19]314}但是,在整体上仍然可以给出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生态文明战略目标的积极引导下,通过培育和推广“生态态度”,在国家内部使不同社群的民众融合为紧密的“保护主义者共同体”;其次,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最后,展开国际合作,特别是地区间合作,实现“生态的世界文明”。

第一阶段的关键在于转变社会观念,这是通过“生态学的发现”(ökológusok felfedezése)实现的。简言之,通过培育和推广“生态态度”或生态观(ökológiai szemlélet),促使人们意识到“所有生物与

其环境构成一个整体系统”^{[21]1835}。人与他人、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在这一整体之中展开的,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实现也应当放在这一整体之中进行考察。进而,对人类活动的分析和规划,都应当受到生态学的指导。

第二阶段是改革国家内部经济运行体系,这是通过所谓“子孙后代的发现”(gyermekeink felfedezése)实现的。在此,塞什陶伊已经揭示出后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内涵,他指出“在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时,必须意识到子孙后代(的福祉)。这不仅仅是指他们的健康,而且还指他们的生活不能因为我们突破污染的阈值而承受风险。”^{[21]1837}在为后代考虑时,经济发展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发展。事实上,他认为以利润为驱动的经济体系应当彻底变革为以长远的目标和价值为导向的经济体系。^{[21]1836}

主要策略是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也即一方面考虑经济发展会受到生态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提升也会受到现实经济发展因素的制约。如果超出生态因素制约,就会引发生态灾难;如果超出经济因素制约,就会导致经济停滞或倒退。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可选择区间”(alternatíva - rés)。处于工业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国家,可以在这个区间内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做出权衡和选择。^{[22]27-28}

第三阶段是实现“生态的世界文明”,这需要借助“邻人的发现”(szomszédaink felfedezése)。塞什陶伊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具有相同根源。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定也意味着实现人与他人的和解。实现生态文明,必定也意味着实现不同国家、民族的和平共荣。

生态文明最终将以“生态的世界文明”形态实现,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环境问题是无国界的。一种环境污染往往会影响到地理环境类似的相邻国家。而且,在终极的意义上,地图上虽然有100多个国家,却只有一个生态圈(bioszféra)。^{[21]1834}其次,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可选择区间”是与其他国家的选择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会缩小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可选择区间”,也会缩小地球整体的“可选择区间”(planetáris alternatíva - rés)。既然生态灾难和经济停滞对所有人和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不可

接受的选项。那么,不同国家就应该团结起来,相互扩大对方的“可选择区间”,促进全球范围的生态和经济发展。

具有“末世论”特征的生态危机,正是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机会。为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应当和平相处,更应当积极合作。塞什陶伊强调,这种合作,不仅应该发生在具有相同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而且应该超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界。可以率先通过将那些处于相同地理环境的邻近国家(例如波罗的海国家和多瑙河流域国家)团结起来,进行区域性合作,然后进一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最终实现“生态的世界文明”。

四、塞什陶伊生态文明学说的影响与启示

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一些讨论。1972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文发表后,当年9月29日发行的《周刊》(A Hét)杂志上就对此文进行摘编介绍。^[24]11月,罗德尔·拉斯洛(Röder László)撰文讨论塞什陶伊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对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指出该研究“在当前,甚至在未来,为‘最终解决我们共同的事务’构建了重要框架。”^{[25]37}匈牙利社会学家塔卡斯·费伦茨(Takács Ferenc)在1975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理念问题的论文中也曾讨论塞什陶伊在《智慧秩序重归大地》一文中的观点。^[26]

在国际学术界,塞什陶伊的学说没有引起太多反响。这种状况不能完全归咎于语言障碍。虽然他主要以匈牙利文写作,但是在1971年国际地理联合会欧洲区域会议上的论文是以英文发表的,该论文的英文全文被收入西方知名的《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1973年组织出版的“匈牙利社会学专刊”之中^[19],其缩减版也曾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人与环境》(Man and Environment)英文论文集中^[27]。

塞什陶伊之所以未受国际学术界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某些特殊的际遇。在“匈牙利社会学专刊”出版后,美籍匈牙利裔社会学家尤利乌斯·雷兹勒(Julius Rezler)评论道:(收录的13篇论文)

大多数是高质量的,可以与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媲美,……只有少数论文结构混乱、概念不清。”塞什陶伊的论文在雷兹勒看来显然属于后者。“塞什陶伊的研究极为抽象,……不太清楚他想要说明什么。首先,他使用的概念相当复杂而且常常定义混乱;其次,很难搞清楚其关于社会学在(环境规划)应用中的角色和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28]228}雷兹勒作为20世纪70、80年代匈牙利社会学在西方重要的引入人,他的评论必定对塞什陶伊在西方的接受产生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与后来长期主导国际环境治理秩序的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存在诸多根本分歧。首先,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前者认为是由西方现代文明存在的系统性、整体性问题引起的,而后者认为是由文明的某一方面(如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其次,在环境保护目标上,前者认为必须由整体的积极目标引领,后者则更关注具体的消极目标如何实现,例如DDT和氟利昂的禁用以及温室气体的减排等。再次,在文明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前者强调恢复一种和谐的亲密关系,力图消解人与自然的疏离。后者力图恢复并维持两者的“和平”:人类尽量减少对自然的伤害,以避免自然反过来伤害人类。最后,前者将生态危机的应对视为建立“世界文明”的契机,而后者将其视为国际政治角力的新战场。或许因为这些根本分歧,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在当时的环境治理实践中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距离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状况表明,过去由西方环境保护思想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格局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系统反思和重塑的时刻。在这种反思和重塑的过程中,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启示意义。

第一,环境保护事业需要由正向的、积极的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引领。五十多年来,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似乎总是在告诉人们“不去做什么”,而很少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在国际环境治理话语中,“禁用”“停止”“减排”“维持”等带有负面消极色彩的概念比比皆是。由于较少给出正面的愿景,较少告诉人们环境保护最终会将人类引向何种生活,西

方式环境保护缺乏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产生的内在的积极驱动力,常常只能诉诸道德谴责或“如果不停止某种行为,灾难就会降临”的外在恐吓。

第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有机统一的。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各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应对环境问题。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局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扭转。借用塞什陶伊的比喻:过去种种环境治理实践或许阻止了“地球之舟”上产生新的裂隙,或许让船下沉得更慢了,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船的下沉。这是由于西方环境保护理念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根源在于西方式现代化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以及人与他人关系的疏离。

第三,生态文明应当是全球人类的共同目标。环境保护不能沦为少数生活优渥的精英主义者标榜自身道德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话语工具,更不能成为少数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的应对需要全球各国同舟共济、合作参与。生态文明是关乎地球生命和全体人类未来的重要事业,其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性。生态文明的最终形态必定是一种“世界文明”。

五、结语

对生态文明理念源流的考辨以及对塞什陶伊生态文明学说的重新发现和阐释表明,“生态文明”不是一个专属于中国特殊语境的概念。生态文明在思想起源和发展上具有全球性特征。从1951年麦凯首次使用“生态文明”一词,到1972年塞什陶伊提出较为系统的生态文明学说,再到21世纪中国政府和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生态文明做出重要推动,世界各国许多学者都曾参与在生态文明理念发展历程之中。作为相关研究中较早出现的系统学说之一,塞什陶伊的生态文明学说在基本内涵上也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生态文明不仅被视为全球环境保护事业中必要的、积极的整体战略目标,而且生态文明的实现过程需要不同地区和全球各国的合作,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形态更是在于实现“生态的世界文明”。

参考文献

- [1] 贾卫列. 生态文明的由来[J]. 环境保护, 2009(13): 75.
- [2] 卢风, 曹小竹. 论伊林·费切尔的生态文明观念: 纪念提出“生态文明”观念40周年[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 42(2): 1-9.
- [3] 王雨辰, 李芸.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3): 76-82.
- [4] 王希群. 对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 1-17.
- [5] 鞠昌华. 生态文明概念之辨析[J]. 鄱阳湖学刊, 2018(1): 54-64+126.
- [6] 杨朝霞. 中国环境立法50年: 从环境法1.0到3.0的代际进化[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88-107.
- [7] Gare A. The Eco-socialist Roots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21, 32(1): 37-55.
- [8] Huntington E. Clim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M]//Bait-sell G. *The Evolution of Earth and 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330-383.
- [9] McNeill J R. President's Address: Toynbee a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J].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14, 19(3): 434-453.
- [10] MacKaye B. VI. From Continent to Globe[J]. *The Survey*, 1951, 87(5): 215-218.
- [11] Freyre G. *Brazil*[M]. Washington, D. C: Dept. of Public Information, Pan American Union, 1963.
- [12] Elton C. Carrion, Dung and Nests[M]//*The Pattern of Animal Communitie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66: 319-344.
- [13] 李比茨基. 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J].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1984(18): 54-56.
- [14] Захарова Е Ю.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поняти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J].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2012, 3(17): 64-66.
- [15] 费切尔 I. 论人类生存的环境: 兼论进步的辩证法[J]. 哲学译丛, 1982(5): 54-57.
- [16] 阿列克谢耶娃 В Г. 青年私生活中道德立场的形成问题[J].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1985(12): 73-75.
- [17] 陈一筠. 苏联社会学界在社会经济改革新形势下的动向[J]. 苏联问题参考资料, 1986(1): 25-30.
- [18] 吴也显. 我国的国情与课程改革[J]. 课程·教材·教法, 1986(5): 24-27.
- [19] Szesztay A. On the Place of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odel of Environment Planning[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17(1-suppl): 299-319.
- [20] Szesztay A. A Környezetvédelem és szociológia[J]. *Forrás*, 1972, 4(2): 21-27.
- [21] Szesztay A. A föld bölcse rendje visszatér. [J]. *Korunk*, 1972, 31(12): 1833-1839.
- [22] Szesztay A. Környezetvédelem és gazdaságfejlesztés[J]. *Valóság*, 1972, 15(9): 25-35.
- [23] Szesztay A. *Veszprémben végeztek*[M]. Budapest: MTA, 1967.
- [24] Névtelen. Környezetvédelem és gazdaságfejlesztés[J]. *A Hét*, 1972, 3(39): 16-17.
- [25] László R. Közgondolkodás, kapacitáskihasználás, nyereséghányad, környezetvédelem[J]. *Népi Ellenőrzés*, 1972, 14(11): 36-37.
- [26] Ferenc T. A Környezetvédelem Eszméi - Társadalmi Kérdései[J]. *Természettudományi Közöny*, 1975(1): 2-4, 17.
- [27] Szeszta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wards a Methodological Model of Environment Planning[M]//*Man and Environment*.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4: 67-72.
- [28] Rezler J. The Rebirth of Sociology in Hungary[J].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74, 8(2): 223-229.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Szesztay's Studi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EN Y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have emerged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a broader literature survey shows that the te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used b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51. As an important early researcher, Hungarian sociologist András Szesztay had conducted systematic and in-depth studie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1970s. He believes that the roo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which is caused by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Thus, he proposed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ust be guided by the positive strategic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restor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o achieve the harmony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e further discussed a three-stage roadmap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logical world-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thought;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本文责任编辑: 董春雨 赵月刚)